

# 单一但分层的国际秩序的根源及其演化

孙兴杰

**〔摘要〕** 国际秩序加速演化,地缘政治冲突、产业变迁、治理失衡、气候变化等因素共同促成了国际秩序的“突变”、国际秩序的“分层”结构以及不平衡发展,削弱了“大合流”的动能,“分流”的势头呈现出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塑造了“单一”的全球体系,“单一”并不意味着均质和同一,反而,差异性造成了多样性,多元主体互动规定了边界,塑造了身份,构成了国际秩序演进的核心动力和逻辑。国际秩序的变迁越来越超出了国家的范畴而有了更大的时空含义,只有扩大国际秩序的时空框架体系,探究人类社会秩序的演进逻辑,国际秩序的研究才能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的狭隘视角,以多元鲜活的人类历史经验作为一面镜子,透视当下剧烈变迁的国际秩序的来龙去脉。

**〔关键词〕** 国际秩序;分层;分流;人类秩序;长时段

世纪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大大加速了国际秩序演变,人们所熟悉的世界正在远去,国际秩序已经呈现出不同于三年前、十年前的样貌。国际秩序的结构如同千层饼,在“全球化”的包装之下,其内里结构是“分层”的,各个层面所形成的断裂线越来越清晰和难以逾越,由此形成了国际秩序结构的“分流”。二战结束以来的“大合流”势头趋缓,中心—边缘的国际秩序结构有可能重新强化。俄乌冲突带有明显的体系性对抗色彩,加上美俄是全球两大超级核武国家,这场冲突对国际秩序的不同层面构成了强烈冲击。<sup>①</sup>因此,国际秩序演变超越了“事件”范畴而带有系统性和结构性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加速了全球“大合流”的进程,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阵营化消解,市场经济体系扩散到全世界,传统地缘政治消退,非传统、全球性安全威胁上升。生存、发展、安全目标彼此缠绕,“国际”政治的色彩淡化,而全球政治、全球治理等成为热门话题。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危机、地缘政治危机以及国家治理危机凸显,<sup>②</sup>国际秩序的“大合流”受挫,2016年美国大选以及英国脱欧标志着经济危机的政治后果呈现出来。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战略收缩与调整表现为美国从多边主义框架中退出、美国从中东地区的战场撤退以及美国与盟国权责关系的再平衡。<sup>③</sup>大国竞争和

孙兴杰,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珠海519082)。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规律与国际秩序演进研究”(22VLS015)的阶段性成果。

①A. Kortunov, “Restoration, reformation, or revolution? Blueprints for the world order after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4, No. 2, 2022, pp. 183–208.

②W. Chen, M. Mrkaic & M. Nabar,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10 years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No. 2019/08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19/04/26/The-Global-Economic-Recovery-10-Years-After-the-2008-Financial-Crisis-46711>, 2024-01-28.

③M. F. Lujan, “Light footprints: The future of American military intervention”, [https://www.files.ethz.ch/isn/161879/CNAS\\_LightFootprint\\_VoicesFromTheField\\_Lujan.pdf](https://www.files.ethz.ch/isn/161879/CNAS_LightFootprint_VoicesFromTheField_Lujan.pdf), 2024-02-01.

博弈重新成为国际秩序的主要基调,俄乌冲突既是大国政治回归的标志,也加速了大国政治的调整。在单一的全球体系之下,国际秩序的“历史回归”会回到何种时间节点呢?国际秩序的变迁动力不仅来自大国政治的复归,更来自单一全球体系内部的结构调整,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只是国际秩序的一个层面,只有在人类秩序的超大时空框架之下,才可能触碰到国际秩序的“元”结构。本文首先借鉴研究人类秩序的多学科知识和观点,尝试分析国际秩序的长时段结构和基本元素,将国际秩序置于人类秩序形成与演化的框架之下,发掘国际秩序背后的深层结构。以“分层”来指代国际秩序中的等级性结构以及不同性质权力的分化;以“分流”来描述不同权力中心因不均衡发展而形成的分殊。具有广度的国际秩序空间中存在多元中心,合流是趋势,但“分流”的可能依然存在。

## 一、国际秩序的人、时间与空间

何谓国际秩序?这是国际关系研究中老生常谈但又无定论的一个问题。对于国际秩序的定义和认识折射出国际关系学的危机,“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很难为其他学科贡献“大思想”,<sup>①</sup>当下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在特定的国家理论基础之上,而国际关系学又自我隔离于政治学之外,聚焦于“无政府状态”的假说。如贾斯汀·罗森博格所呼吁的,“国际关系学也是建立在有关社会世界的基本事实之上,对于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而言都充满了意义。人类世界由共存的诸社会的多样性构成。”<sup>②</sup>国际关系学要为自己寻找真实的研究对象和本体,从“无政府状态”中摆脱出来。国际秩序并非只是“国家”之间形成的秩序,而是多元主体互动的结构和演变的进程,多元主体通过何种互动形成了何种相对稳定的组合,决定了秩序的形态及其演变的动力。

第一,对国际秩序的研究需要突破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以主权国家为中心和无政府状态假说的束缚。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对国际秩序的界定受到国家中心主义的约束,在欧洲主权国家的“想象”基础之上以构建主权国家为基本要素的国际秩序,而战争与和平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爱德华·卡尔认为,“国际关系学中的目的成分,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国际关系学诞生于灾难性的大型战争,驱使和激励这门新学科先驱学者的最主要目的就是避免国际关系中再次发生这样的灾难。防止战争的强烈愿望确定了学科整个初始过程和发展方向。”<sup>③</sup>他激烈地批评了乌托邦主义的想象,但是并没有将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转移到秩序本身,只是在简单提及政治秩序的实质之后,就集中笔墨论述国际秩序中的权力与道德问题,放弃了从“人是群居动物”这一论断出发研究人类社会秩序演进的进路。英国学派的重要代表赫德利·布尔以国家为基础,将国际秩序定义为“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和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sup>④</sup>主权国家之上再无权威,无政府状态就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圣杯”——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家似乎都难以摆脱以主权国家为中心、以无政府状态为假设前提的禁锢。也正因如此,国际秩序的建立、维系与变迁主要集中于国际法、大国、均势、外交以及战争等内容。<sup>⑤</sup>与英美国际关系理论家对主权国家、无政府状态的推崇不同,雷蒙·阿隆强调了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包括国际关系的主体(政治单元)都笼罩在不确定之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区别在于外交官和士兵的活动,他们的活动彰显了不同政治单元的边界。与体育竞赛、经济发展等不同的是,外交一战略行为没有明显的目标,然而战争的风险要求它计算力量和手段……战争与和

①[英]贾斯汀·罗森博格:《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宋鸥译,《史学集刊》2017年第1期。

②[英]贾斯汀·罗森博格:《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

③[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8页。

④H.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4th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 8.

⑤[英]马丁·怀特:《权力政治》,宋爱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平的交替取舍使得阐述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成为可能。”<sup>①</sup>和平与战争是国际关系面临的主要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秩序中的常态。因此,承认多样性,接受多样共存的现实,探求秩序演化的内在逻辑和动力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二,国际秩序植根于人类秩序的漫长历史。国家的历史是非常短暂的,国家或许只是人类秩序中的一个片段。政治学家詹姆斯·C. 斯科特的反思可谓深刻:“如果把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的物种史作为一个尺度,那么初民农业社会和国家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出现,只落在这段历史最近的5%。而再取这个尺度加以衡量,那么化石能源时代,起始于18世纪的末端,在人类物种历史上所占不过最末端0.25%的尾巴而已。然而,由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现在却只盯着这最后一个时代,精力越来越专注于我们人类在此期间留在地球环境上的足印。”<sup>②</sup>国际关系学产生不过100年,而国际关系学所研究的对象无论是19世纪以来,还是1648年以来的历史都是人类历史的一瞬间。法国学者伯特兰·巴迪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平的欧洲后裔们之所以傲慢,是因为他们认为,“是欧洲人发明了这个原以为能够经久不衰的国际秩序,他们甚至是国际秩序这一概念本身的发明者。”<sup>③</sup>不可否认,19世纪以来的大转型的确创造了一个迥异于先民的生存环境,与人类的祖先相比,工业化、城市化的世界是人造环境,甚至所谓自然景观也是经过人类改造的,由此而出现了所谓“人类世”的说法。但国际秩序并不是随着国际关系学诞生而产生的,国际秩序与人类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是在人类上万年的演化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并不会随着理性国家、市场经济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而被“重置”。最近一二百年来的历史也不能遮蔽和取代过去几万年的历史。比较合适的做法应该是将现代性的大转型置于人类社会秩序演化体系中,思考其转折性和突变性是否可以与火的使用、语言的出现以及定居革命相提并论。如此才能避免非历史主义、现代主义的偏狭,也能够寻找到在如此现代的世界出现了如此多“老问题”的答案。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借助交通和通讯革命,距离已经消失了,但是“世界主义”依然只是美好的愿望。“世界越来越拥挤:在今后的半个世纪里,人类这个曾经四处觅食的种类,数量将增加到90亿。根据不同的情况,跨越国境的对话可以是愉悦的,也可能是令人烦恼的;不过,无论它们是愉悦的还是令人烦恼的,它们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现象。”<sup>④</sup>即便距离消失了,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也不能让全球几十亿人变成“村民”;相反,随着距离拉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跨文化交流 and 理解变得更加频繁和重要。不同群体的观念和思维的边界并没有消失,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间中,都生活在小型的、移动的和分散的共同体之中。人类的祖先在几万年之间遍布了地球的各个角落,但是却是稀疏地散落开来的。在定居和农业革命之前,人类基本依靠采集和狩猎为生,几万年来,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的生存和繁衍过程中,不同群体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习俗和比较明确的边界,构成了每个群体身份认同的“硬核”。“由于人类对群体边界给予严切的关注,我们也可以把自己叫作‘局域性的物种’。局域主义在今日有着各种形式,例如宗教偏执、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它们因文化而异,并随着时间演变。”<sup>⑤</sup>在漫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意识和观念已经成为人性的一部分,“现代社会并不是10年、30年和100年前突然出现的,它们是逐渐从数千年前的早期人类社会演变而来

①[法]雷蒙·阿隆:《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朱孔彦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②[美]詹姆斯·C. 斯科特:《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田雷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页。

③[法]伯特兰·巴迪:《世界不再只有“我们”:关于国际秩序的另类思考》,宗华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页。

④[美]奎迈·安东尼·阿皮亚:《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苗华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⑤[美]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张弘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3页。

的。”<sup>①</sup>比如现代人对名誉的关注,难以维系的亲密关系等等,都与漫长的演化历史有关,当下身份政治的兴起与人类漫长的小共同体历史密不可分。

第三,人类社会秩序是复杂合作的体系,植根于人类天性。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质或许是构建复杂合作体系的能力,人类的合作超越了血缘纽带而最终形成全球性网络。全球性国际秩序是人类合作体系几万年来演化的成果。为什么是人类而非其他物种建立起了如此具有广度和密度的秩序呢?人类合作的动力主要来自生存需要。在更新世晚期人类要生存下去就要跟其他动物竞争,通过合作猎捕大型猎物,提升群体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从而实现了规模收益递增,而在合作过程中形成了惯例和规范,或者说是合作的“文化基因”。首先,“人类群体设计了种种方法保护其利他成员免于遭受自利者的利益剥夺。在这些方法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回避、排斥甚至处死那些搭便车者以及其他违背合作规范者,这些行动都是具有公益性质的。”<sup>②</sup>其次,将合作的规范内化,变成群体内的行为规范。最后,合作的收益会扩散,那些具有合作能力的群体能够存在并壮大起来,由此带来合作文化的传播。“社会脑理论”、文化—基因共演化理论以及文化多层选择理论等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人类合作之谜。

美国学者马修·利伯曼和英国学者罗宾·邓巴是社会脑理论的倡导者,他们都认为人类具有社交天性,也正是这种特质进一步推动了大脑的进化。“我们的大脑天生就与他人相互连接。人类的社会心理一部分可以追溯到亿万年前最早的哺乳类动物时期,而余下的社会心理则是在最近才进化出来的,而且很可能是人类独有的。”<sup>③</sup>社交天性是人类能够互相连接,具有理解他人的心智能力以及协调群体内关系的能力。研究表明,人类的近亲并没有进化出语言能力,语言使人类获得了文化这一独有的进化方式。马修·利伯曼也强调,“共情可以说是我们大脑的社会认知成就的顶峰,或者说是社会成就的最高峰。它要求我们去理解他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然后以有利于他人以及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方式行事。”<sup>④</sup>语言传递的不仅是信息,还构建了一个心灵世界,在哲学家所论述的“意向性等级”(每一个等级的意向性代表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心思,比如第一等级是自我认识,第二等级是认识他人),只有拥有语言的现代人能够达到第五等级,少数人能够达到第六等级,“最高等级的意向性可以视为由神话、传说和先祖构成的世界。”<sup>⑤</sup>语言、心智能力使得人类能够构建超越时空的秩序和联系,由此,产生了明确的时间记忆和空间观念。可以说,语言、心智能力使得人类进化与其他物种以及人类的近亲“分道扬镳”了。

基因—文化共演化理论则将文化作为人类进化的重要动力,与基因共同促进了人类的进化。“我们把文化定义成一系列偏好和信念的聚合,它们是通过基因传递以外的途径而获得的。文化有着自身的演化力量,而不仅仅是基因和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sup>⑥</sup>文化将人类的规范、习惯内化并且传递下去,尤其是为利他主义合作创造了条件,使合作超出了亲缘关系,延伸到更大范围,进而解决合作中的“搭便车”难题。“强互惠模式”通过惩罚利己主义者、奖励合作者而形成了合作的规范:合作者能够获得奖赏,在更大的范围内会获得好的名声,进一步激励合作者,并且成为一种规范,甚至是道德观念,即自私利己是不道德的行为,不仅会遭到排斥和惩罚,还会产生羞耻感,如此便会对个体形成内在的约束。在人类合作体系的演化过程中,“利维坦”并不是必要条件,“无政府状态”之下的

①[英]彼得·图尔钦:《超级社会:一万年来人类的竞争与合作之路》,张守进译,大同: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80页。

②[美]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第5—7页。

③[美]马修·利伯曼:《社交天性: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动力》,贾拥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viii页。

④[美]马修·利伯曼:《社交天性: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动力》,第173页。

⑤[英]罗宾·邓巴、克莱夫·甘伯尔、约翰·格列特:《大局观从何而来》,刘腾达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21页。

⑥[美]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第19页。

合作是人类社会秩序的常态。

与基因—文化共演化理论并行的文化多层选择理论,其核心观点是群体间的竞争是群体内合作演化的条件,恰恰是竞争和冲突推动了合作。更新世晚期,地球气候系统趋于稳定,人类小共同体之间相互接触的几率大为增加。在一个充满捕食者的危险世界中,群体的生存和维系受到内部合作与外部竞争的影响。“一个有着恰当的混合技能的团队需要谨慎构建。换句话说,团队需要多样性。同时,团队成员需要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以便进行有效率的沟通和协作,而且有助于建立彼此间的信任。最重要的是,一个团队需要在组织方式上避开合作者困境——如何鼓舞成员共同合作来完成一个集体性的目标,而不是依靠别人的努力浑水摸鱼。”<sup>①</sup>正是群体间竞争与冲突迫使群体内成员选择合作,否则一个利己主义者占主导的群体将因为难以合作而被消灭或者吞并。合作主义者能够为群体提供公共产品,由此极大增强了群体的竞争力,在不断的竞争和冲突中生存和壮大,而合作获得的益处会被内化为群体规范,成为制度和文化。在此过程中,群体内的差异减少,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和观念。能够建立起复杂合作网络的群体在竞争中胜出,并且成为主导性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无政府状态其实是对群体间竞争的确认,群体间的竞争推动了群体内部的合作与和平。统一的“利维坦”在形式上消除了竞争和冲突,然而,人类小共同体的竞争—合作的逻辑在统一的“利维坦”内部复活。文化多层选择机制所内涵的竞争—合作逻辑使人类社会秩序的演化进入了快车道,从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早期,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政治秩序大概可以追溯至此。美国学者马丁·诺瓦克和罗杰·海菲尔德在《超级合作者》一书中提出,即便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混沌世界中,合作者的平均出现频率是31.78%。<sup>②</sup>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性是否自私已经不是重点,关键在于合作者出现的必然性以及合作者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几率,即便身处背叛者的环境,合作者不但能够出现,而且会逐渐壮大。因此,两位作者断言,“纵观整个世界的历史,无论是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生物的进化,还是从蚁冢、村庄到城市的发展,合作始终是创造性的源泉。没有合作,进化中的建设性和复杂性也将不复存在。”<sup>③</sup>

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几十亿人共处一个高度互联互通的空间的经验,当下国际秩序堪称人类社会高度发达的结晶。基于主权国家之间互动的国际秩序观似乎已经难以认识和解释国际秩序演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了。是时候找回国际秩序“复杂性”了。从根本来说,国际秩序是天—地—人三者的复杂互动与演化。这并非要完全“还原”国际秩序,而是要从时间、空间和人这三个维度去认知国际秩序。从时间的维度来说,人类社会秩序的历史是地球史的一瞬间,只有在气候系统趋于稳定之后,人类才能生存繁衍,气候问题、自然资源问题以及环境问题并非国际秩序的枝节,而是前提。从空间的维度来说,地球上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地理空间,自然环境约束和塑造了不同的人类观念,不同的空间中的演化路径也大不相同,这也就涉及了人的维度。因此,时间和空间的交汇必然形成多样复杂的时空框架,而在不同的时空框架之下的人以及人的观念也必然是多样的。时空框架体系之下人类的观念和组织形态成为“不可化约”的研究对象。毫无疑问,如果将不同时空框架之下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将大大超出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范畴,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国际关系学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神话”的一种尝试。如罗伯特·基欧汉对国际关系研究提出的期许:“国际关系应有有助于处于任何社会地位和任何身份的人理解政治,而不是成为一门从阿基米德式中性支点谈起的学

①[英]彼得·图尔钦:《超级社会:一万年来人类的竞争与合作之路》,第94页。

②[美]马丁·诺瓦克、罗杰·海菲尔德:《超级合作者》,尤志勇、魏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9页。

③[美]马丁·诺瓦克、罗杰·海菲尔德:《超级合作者》,第7页。

科。它必须是扎根于真实人类的真实生活的一门学科。”<sup>①</sup>

## 二、国际秩序的“历史层积”及其演进

主权国家以及主权国家之间互动而形成的现代国际体系没有终结其他人类组织形式和合作纽带,毋宁说,当下国际秩序建立于人类几万年,尤其是更新世晚期以来的历史基础之上。在人类秩序演化的时空框架之下,国际秩序的“历史层积”显现出来了。国际秩序研究不仅需要警惕“主权国家中心论”,还要反思“国家中心论”以及“定居革命”“农业革命”等概念。斯科特在国家起源的研究中自我警醒:任何对国家形成问题的研究都难以摆脱一种风险,“这就是赋予国家一个显赫的地位,超过了它在一部均衡的人类演化史上本应占据的位置。”<sup>②</sup>这并非否定国家这一新近的人类组织形态,而是从国家的演化进程来解释和认识当下世界中国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国家缘何失败?是生活在所谓“国家”中的人和文化的失败,还是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态的“国家”的失败呢?“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和历史遮蔽了国家这一组织形态背后的人类秩序演化时空框架,人类秩序演化的深层历史结构塑造了国际秩序。从欧洲历史演化而来的民族国家有其局限性,欧洲人通过殖民扩张进而按照自己的观念“制造”了国际秩序,但人类秩序演化的遗产却没有消解,而是在殖民帝国秩序瓦解之后“历史性回归”。

第一,人类从游居到定居是一次历史性转折。定居革命和农业革命之间隔了几千年,这意味着农业革命并不是定居的前提;相反,人类定居是从河流两岸的湿地开始,通过采集和狩猎也可以过上“丰裕”生活。如果环境发生变化,也会从定居转向游居。可见,从游居到定居,国家的建立也并非从无到有的线性过程。农业革命与国家的产生密不可分。斯科特的“谷物起源”假说认为,只有在种植谷物的区域,才能最先建立起国家,谷物生长和收获时间固定、易储存可以成为征税的对象,此外,谷物种植将人类从采集者变成了农人,成为谷物的“奴隶”,由此形成了谷物—人口的组合,早期国家基本是在谷物—人口核心区建立起来的。当然,早期国家只处于地球上的“星星点点”,比如尼罗河、两河流域等。气候变化、土地退化以及战争都可能导致国家崩溃,从国家历史的叙事角度来说,国家崩溃之后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代”,因此在史书中不乏这样的“黑暗时代”记载。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家解体之后,人们又回到了非国家的采集狩猎的秩序中去了。对于人类生存来说,国家并不是必需品,退回到采集狩猎时代并不意味着“黑暗”降临。马歇尔·萨林斯认为,“狩猎采集经济,已经克服了自身的一切弱点。周期性的游居,对财产和人口的限制,既是经济实践的必要,也是对环境创造性的适应,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游居与限制才成其为美德。”<sup>③</sup>以国家作为线索的历史演化是断续的,即便两河流域也并非一部国家兴衰的历史,世界大多数地区相当晚近才进入国家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并非人类的先祖,而是直到19世纪还没有进入国家时代的人类社会,通过观察这些“前国家”的人类组织,了解和反思人类社会秩序的演化历史。

第二,人类社会秩序的演化有赖于竞争与合作的逻辑。在生存经济之下,人类不储备财产,时间主要用于“闲聊”和社交。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并不依靠交换或者市场的方式,而是通过“礼物”。法国学者马塞尔·莫斯提出,“在斯堪的纳维亚文明和其他为数甚多的文明之中,交换与契约

---

<sup>①</sup> [澳] 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英] 邓肯·斯尼达尔:《牛津国际关系手册》,方芳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798页。

<sup>②</sup> [美] 詹姆斯·C. 斯科特:《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第14页。

<sup>③</sup> [美] 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2页。

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理论上这是自愿的,但实际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sup>①</sup>礼物贯穿了秩序的全过程,形成了基于礼物为纽带的秩序,在赠礼与回礼的过程中贯穿了竞争与合作的逻辑。一个群体或者群体中的个体的声望和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源于慷慨,北美的印第安人中流行“夸富宴”,每到冬天,各个氏族和部落举行大型集会,举办各种仪式和宴会,“大人物”竞相斗富,通过慷慨赢得名声。声誉、承诺等非理性因素对于秩序的生成和维系至关重要,时至今日,声望依然在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其根源还没有被充分关注。

第三,文字、大型宗教以及马匹的驯化使人类进入了巨型国家和轴心文明时代。于人类秩序而言,这又是一次大转折!文字和官僚制建立了一套符号化的信息交流系统,从而为跨时空的等级政治秩序奠定了基础,“从非符号化的、非语言的处理和交流关于世界的信息,到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符号化的、充满语言的一切,我们的祖先完成了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转变。这是认知能力和精神世界的一个史无前例的质的飞跃。”<sup>②</sup>等级性政治秩序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王权。如何实现王权的合法性是一个问题,仅仅依靠联盟、亲缘合作以及武力征服或可建立起一个领土辽阔的国家,但是王权没有实现非人格化,即便是亚历山大大帝这样的“英雄”建立的帝国,在其死后,也没有逃脱土崩瓦解的命运。轴心时代的普世宗教和文明弥合了王权的等级性与平等人类小共同体的扁平结构之间的鸿沟。普世宗教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身份,扩大了“我们”的范围,基于共同信仰和身份的合作网络随之骤然增加。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普世宗教提供的共同身份,王权是脆弱的,也是短暂的。“全世界各地的‘大人物’社会经常都使用相同的方式来降低家庭之间的摩擦:以仪式和语言来控制由亲戚关系而来的先天情感。”<sup>③</sup>而马匹的驯化以及游牧民的兴起,大大提高了人类互动能力。伴随着草原游牧民的兴起,欧亚大陆上的农业国家的规模也大为扩大。面对游牧民的威胁,农业国家要么“胡服骑射”,模仿和学习建立与之对抗的军事力量;要么修建城墙(长城)。值得关注的是,游牧帝国和农业帝国的演化几乎是同时的,这又是竞争—合作机制的例证。

第四,帝国的兴衰构成了国际秩序变迁的重要线索,从帝国向后帝国的大转型中,竞争—合作逻辑从纵向变为横向。帝国是等级性的,包容和接纳差异性,帝国秩序为了空间的广度而放弃了同质化,因时因地采取差异化统治,其本质是对小共同体组织的让步。帝国的等级性结构如同积木搭起来的房子,每一块积木的结构是完整的,也能自我维系;帝国的崩溃意味着等级性结构的坍塌,每块积木重新回到了自成一体的状态。从竞争—合作体制来说,帝国是纵向的竞争—合作机制,中央—地方、王权与官僚体系都贯穿了纵向竞争—合作的逻辑。从帝国到后帝国的转折点在于“罗马之后无罗马”。罗马帝国西部的等级性帝国秩序崩溃之后,虽然经过几次尝试,但是最终没有实现帝国秩序的重建。教会与国家之间、教会内部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世俗国家的构建和国家间体系的形成,从而形成了横向的竞争—合作机制。上百个政治主体之间的横向竞争和战争塑造了欧洲国家和欧洲国家体系,战争成为制造欧洲国家的核心动力,国家之间的激烈对抗和战争加速了欧洲国家内部的建设,最终使国家变成了一个边界明确的权力容器。欧洲国家体系横向竞争而形成高度组织性的秩序,其内涵的能量外溢到其地区,由此而形成了殖民帝国,横向竞争—合作逻辑衍生出了新的纵向竞争—合作逻辑。当全世界被欧洲殖民国家瓜分之后形成了殖民帝国之间的横向竞争体系,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欧洲国家体系横向竞争和冲突的扩大,最终摧毁了殖民帝国,世界进入了后帝国时代。

所谓现代国际体系从欧洲开始,主权国的形成、市场经济体系、技术创新等成为备受关注的问

题,在主权国家中心论的叙事体系中,非欧洲地区成为无历史的民族。欧洲殖民浪潮覆盖了全球,欧

①[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页。

②[美]伊恩·塔特索尔:《地球的主人——探寻人类的起源》,贾拥民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4页。

③[美]罗伯特·赖特:《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李淑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也忽略了国家之外的多样秩序。二战之后技术革命以及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催生了单一全球市场体系,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以及个人之间横向的竞争—合作逻辑促成了超级复合秩序,不仅空间距离被压缩,甚至消失了,时间也被压缩了,速度革命越来越剥夺了人的时间。“速度正在撕裂身体、心灵、国家、共同体,甚至地球本身。随着网络的扩展和连接性的增加,速度接近极限,是到该减速的时候了,否则就将面临系统的崩溃。”<sup>①</sup>现代社会秩序面临的一个根本矛盾在于,在一个被高度挤压的时空体系内,人类几万年演化形成的多样性秩序碰撞在一起,人类智能创造出了日新月异的技术,制造了一个区别于祖先所生活其中的“人造环境”,但是人脑以及人的心智显然尚未适应这个全新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思想是我们大脑的产物,但大脑的进化并不迅速,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经验仍然映射着人类早期对环境的适应,一如人类在 50 万年前的生活图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万年现代人类发明了农业并开始居住在村庄,这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sup>②</sup>单一全球体系的秩序其实是人类几万年演化过程中不同秩序形态的叠加,罗宾·邓巴甚至将现代人称为“太空时代的石机器人”。

在超大时空中去研究国际秩序的来龙去脉,并非为了追述人类社会秩序的复杂历史,而是为了在时间上将国际秩序置于人类秩序演化的进程之中,在空间上剖析单一全球秩序之下的多元空间,正视多样性和复杂性,探寻国际秩序的人性基础,在知识视野上与人类学、考古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等多学科进行对接,避免国际关系学固守“无政府状态”的信条,沦为知识的孤岛。国际秩序是人类社会秩序历时性演化的结果,在变异与选择、更新与继承之间,历时性的演化结果呈现于共时性的结构与形态之中,探究国际秩序的历史,才能在大时空框架之下定位当下的国际秩序。

### 三、单一但分层的国际秩序的底层逻辑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被卷入单一全球体系内,众多的人口被挤压在同一个网络之中,然而,俄乌冲突、新冠疫情以及此前的金融危机确认了在单一体系之中根深蒂固的边界。单一网络具有超强的传染性,而在应对瘟疫、战争、经济危机等系统性风险的过程中要减少网络的复杂性,这并非意味着复杂系统的崩溃,而是在单一体系内既有的时空边界的重现。在单一国际体系的“形”之下是分层的结构,如此构成了单一但分层的国际秩序的“形态”。

#### (一) 单一地缘政治体系的形成及其运行逻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动员,高强度的竞争带来了群体内部高水平合作。二战后的冷战将世界“半球化”,形成了两大阵营对垒的态势。在核武器这一超级武器的介入之下,两大军事极端对峙半个世纪,但没有再次爆发世界大战,人们也将冷战视为“冷和平”,这正是竞争—合作逻辑的反映。“长和平”以及核武器之下的和平意味着人类合作秩序能够驾驭这一超级武器,当然其中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爱因斯坦曾有句名言,如果第四次世界大战爆发,人类只能用石器和木棍打仗。人类在发明和研制了原子弹之后,曾经 3 天之内用了两次,但自此之后,没有再使用过。不使用核武变成了政治和道德的规定,甚至成为一种“禁忌”。核武器俱乐部成员数量甚至比人类先祖的小共同体成员还要少,在这个小共同体中,背叛者、利己者会遭到身体和道德的惩罚。爱因斯坦所说的核武器时代和石器时代又如此戏剧性地连接在了一起,人类从石器到核

---

<sup>①</sup>[美]马克·泰勒:《从马丁·路德到大数据时代到速度、金钱与生命》,文晗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50 页。

<sup>②</sup>[英]罗宾·邓巴:《社群的进化》,李慧中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09 页。



武器用了几万年,而从核武器时代回到石器时代可能只需要几分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驾驭核武器,维持和平以及人类的生存有赖于人类几万年演化出来的生存与合作的智慧。人类天性是合作的,而非杀戮,冲突即使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避免(争论者停止交往)、容忍(双方不承认存在争论话题)、协商(产生相互能接受的妥协)、解决(第三方解决问题,例如调解、仲裁和裁决)等方式加以管理。<sup>①</sup>

二战的结果昭示着,战争的结果取决于集合伙伴的能力以及资源整合的效率。在二战中,殖民帝国广泛动员了殖民地的人力和资源,传播了民族主义和主权国家的理念,从而为二战后殖民帝国的瓦解埋下了伏笔。二战结束之后,战时同盟瓦解,美苏两国合作关系破裂,核武器、意识形态、联盟政治以及平行市场体系共同推动了两大阵营体系的形成。<sup>②</sup>“冷战是一场跨越界限的政治—意识形态性、经济性、技术—科学性与文化—社会性冲突,其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直至日常生活中。”<sup>③</sup>冷战造成了两个“半球化”的国际秩序,但是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峙和竞争也推动了内部的合作和整合,冷战所包含的竞争—合作机制全球化了,可以说,冷战推动甚至制造了单一全球体系。

首先,冷战阵营对垒加速了后帝国时代的来临。美苏两大强权的意识形态都带有“去殖民化”的内涵,两强竞逐之下,为新兴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创造了空间。可以说,冷战为国家的建立提供了非常舒适的环境,从冷战期间国家数量的增长就能看到,这是个主权国家“全球化”的时期,联合国成员国数量快速增长,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单一国际体系建立起来。

其次,冷战是两个同盟体系之间的对垒,体系之间的横向对抗加强了体系内纵向合作,美苏两大国各自组建了等级性的同盟体系。<sup>④</sup>马歇尔计划是美苏合作关系破裂并各自转向“半球化”体系的开始。“美国政策的反转带来了马歇尔计划,借此美国最终资助了西欧的重建。马歇尔计划标志着美国政策的深刻转变,从追求全球多边体系和美国商业利益转向促进欧洲地区主义。”<sup>⑤</sup>美苏之间的竞争不仅关系到安全,也关乎荣誉,作为体系内的老大,如何能够维持自己的权威呢?除了依靠自身的实力之外,还需要慷慨,如同北美印第安人的“夸富宴”一样;除了斗富(显示实力)之外,还需要慷慨赠送礼物(不对等的市场开放、安全保护等等),权威不是通过强制,而是通过慷慨和宽容实现。冷战所形成的体系性对抗,决定成败的是体系内的活力或者是合作能力的强弱。冷战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终结,其根源是苏联主导的阵营内部的合作能力稍逊一筹。事实上,两大阵营内部形成了国际安全秩序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分层和磨合,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联盟体系的界限分明,尤其是在中欧地区成为两大军事阵营的对峙前沿。而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市场经济以价格体系为纽带进行资源配置和有灵活性、韧性的利益调整,安全和经济利益可以通过市场方式进行调度,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则以计划经济或者指令经济为基础。值得关注的是,体系之间的竞争与体系内合作是正相关的。事实上,美国的盟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是“购买”美国的安全保障;相反,美苏之间的对抗越激烈,美苏就越不需要向体系内的盟国作出更多让步。冷战期间的几个缓和期是体系内分歧增多的时期,阵营对垒的边界趋于模糊,比如美国与西欧之间关于美元霸权的争论,中苏论战以及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干涉等,这与历史上

---

①[美]唐娜·哈特、罗伯特·W. 苏斯曼:《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郑昊力、黄达强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10页。

②D. Reynold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The wartime alliance and post-war transitions, 1941—1947”,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45, No. 1, 2002, pp. 211—227.

③[德]贝恩德·施特费尔:《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孟钟捷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④P. Devine, S. Joshi & A. S. Mahmud, “Alliance formation in a multipolar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223, 2024, pp. 248—277.

⑤[美]罗伯特·吉尔平:《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钟飞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86页。

农业帝国与草原游牧帝国之间的对抗具有相似性。

最后,核武器这一超级武器使人类战争能力得到空前提升,核武器的破坏能力加上远距离投射能力使人类获得了毁灭地球的能力。“人类战争的突出特点是有能力从远处进行机动性攻击。”<sup>①</sup>核武器与导弹的结合使人类战争能力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从投掷性武器到马上民族的弓箭,再到坦克、大炮,最终通过核导弹实现了全球单一的战争体系。而人类能够使用投掷性武器这一特质使人类祖先能够驯服群体中的“老大”,即便力量最强者也可能死于弱者的武器,由此促进了人类的共存,以及平等主义。“对于这样一种既可以毁灭对方,也可能令自己性命难保的武器,任何政治团体在使用它之前都会非常谨慎。”<sup>②</sup>核武器巨大的破坏能力改变了战争的目标,从赢得战争变成了阻止战争,至少是避免核战争。杜鲁门总统在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之后,已经意识到核武器的独特性,原子弹对广岛、长崎造成的巨大破坏使杜鲁门思考是否还能将原子弹当作武器再次使用。杜鲁门坚持将核武器控制权掌握在总统手中,而不是交给一线将帅军官,由此确立了最高权力对核武器这一绝对武器的绝对控制。

在美国垄断核武器的几年之间,美国试图建立一套国际合作机制,共同控制这一绝对武器。核武器的“去武器化”源于核武器会打破人类形成的多样性“共存”的格局,“在一个小世界里,社会动物天生是要合作和通过寻求其他个体的陪伴来减轻压力的。”<sup>③</sup>在掌握绝对武器的政治家组成的“小俱乐部”中,政治家的行为依然受到人类天性的影响。核武器巨大的破坏力会造成群体的灭绝,核武器若成为战争手段,意味着群体的毁灭,敌我边界也就不复存在了,即便盟友也会怀疑美国的行为是否符合人性。

另外,美国在占据核武优势地位时依然威胁使用核武器,那就是强迫和讹诈;而如果美国没有使用核武器的意志力,那就意味着这一强迫或者讹诈难以奏效。核武器从进攻性的要求(比如要求对方作出什么让步)转向防御性要求(要求对方不要有进一步要求),这就是从核强制、核讹诈转向核威慑。在本国国家利益(尤其是防御性利益)没有遇到重大伤害之前,不能使用核武器。美国在朝鲜战争、炮击金门等对抗中最终采取了克制,没有动用核武器,“不使用核武”的规范逐渐确立起来。

随着美苏之间核力量的平衡,尤其是苏联在1957年发射“斯普特尼克”卫星引起美国国内关于“导弹差距”的讨论,美苏之间在导弹和空间技术方面展开竞争,结果是美苏核导弹能力趋于平衡以及发展出侦察卫星技术监控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力量。无论核武实力还是投送工具,美苏核力量趋于平衡,美国的“大规模报复”等将核武器作为武器的战略站不住脚了。“核武器的效用在于不实战使用,这一悖论已经成为核时代的核心特征。它取决于生活中两个明显的事实:核武器,哪怕是小型核武器,都拥有毁灭性能力,足以扭曲目的与手段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战略的首要基础;无论哪个超级大国使用一枚或多枚核武器,几乎可以肯定将招致另一方迅速和相应的报复。”<sup>④</sup>

核威慑包含了“不使用核武器”的禁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苏联对东欧干涉以及后来的阿富汗战争等等,都是核大国对非核国家的战争,但是核大国即便遭遇失败也没有使用核武器。其核心因素在于核国家在战场的失败并没有触及被对手以及盟国认定的防御性核心利益(比如领土、主权等),不使用核武器的规范进一步强化。在核威慑体系之下,核武国家也不得不将战争限制在常规武器层面,进一步推动核武器的“去武器化”,而更具有战略属性。

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寻求限制核武器,包括相互开放天空,限制核试

①[英]彼得·图尔钦:《超级社会:一万年来人类的竞争与合作之路》,第163页。

②[英]劳伦斯·弗里德曼:《战略:一部历史》,王坚、马娟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91页。

③[美]唐娜·哈特、罗伯特·W.苏斯曼:《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第308页。

④[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0—141页。

验等,随着联合国五常迈进核武国家行列,形成了核武国家的“小共同体”。小共同体内部的行为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核大国的核行为和规范:第一,核不扩散的共识,核大国有机维持其核武特权,核武能够带来国际地位,核扩散必然会稀释核武带来的威望和尊严;除此之外,核扩散也意味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增加了达成共识的难度。第二,核国家之间的“透明度”增加了各国行为的可预期性,维持了核威慑体系的平衡。加迪斯就认为,“无论有何优缺点,默许同意的卫星侦察机制的出现的确表明,各国并非总须拘泥于传统谈判才能实现在共同利益领域内有意义的合作。它同样表明,长期的体系性利益,即双方共享的有关避免核战争和保持自1945年以来发展出来的国际体系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有时能压倒美苏两国当前的国家利益。”<sup>①</sup>维持核威慑体系的稳定性、均衡性符合核大国的利益。第三,关乎核大国的“名声”问题。大国的权威依靠其名声,美国对日本使用核武器触发了美国人的羞耻感,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朝鲜战争期间关于是否使用核武器的模棱两可的说法引起了盟国的不满,美国是否为了结束战争而将盟国卷入到一场总体战之中?因此,在冷战中形成“最严厉的限制无疑是针对核武器的实际使用而非拥有核武器”<sup>②</sup>。

## (二) 单一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

全球性市场体系将整个地球几乎囊括进来,除了极个别国家没有融入世界市场之外,绝大部分国家和人口都在单一市场体系之下。当然,世界市场并不是平的,而是等级性结构,也就是说,世界市场是分层的。所谓分层,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不同市场的分层,货币金融、创新性产业处于市场的顶层,相比之下,大宗货物则处于相对下层;世界市场的空间分层,经济地理空间的分布从来不是按照政治边界划分的,而是随着市场网络成长,处于网络节点的城市或者区域处于市场体系的顶层,随着网络的密度和中心度的变化而逐次递减。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全球性大都市处于世界市场体系的顶层,尤其是承载金融、创新、核心产业等总部经济的城市处于世界市场金字塔的顶层。世界市场体系背后是地缘政治体系,虽然经济逻辑与军事政治逻辑出现了分离,但是近现代以来的世界市场秩序的变迁与霸权更迭息息相关,“现代世界经济不时出现的崩溃现象是由于缺乏国际领导者导致的。一个霸主国家的存在有助于促进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维护甚至恢复经济繁荣。当没有国家作为霸主存在时,全球就会爆发经济危机。”<sup>③</sup>

单一世界市场何时出现的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本质而言,世界市场代表了人类合作体系的扩张,建立了跨时空的交换体系,如亚当·斯密所说,“无形之手”形成了分工—合作体系,这是人类几万年合作体系的空前扩张,从小共同体演变为具有全球广度的交换与互惠体系,从人格化的、以亲缘为纽带的合作体系演化为非人格化的、以契约为纽带的合作体系。

贸易是全球性市场的主要推动力量。彭慕兰认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除了必须依靠各种商品、运输手段、技术能力、资本累积、管理机构之外,还受到各个地区文化、自然条件因素的影响,以及暴力的使用等。<sup>④</sup>事实上,在欧洲进行大航海之前,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多个区域性的贸易体系,尤其是蒙古帝国治下的跨欧亚大陆的贸易体系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先声。“在19世纪之前的千百年间,贸易性离散族群一直是组织欧亚非许多地区和美洲大陆商业活动最有效的方法。”<sup>⑤</sup>在欧洲人开启航海

①[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第278页。

②[美]托马斯·谢林:《选择与结果》,熊昆、刘永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367页。

③[英]彼得·特明、[澳]戴维·瓦因斯:《无霸主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和重建》,李丹莉、韩微、马春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页。

④[美]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黄中宪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⑤[美]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第19页。

时代之后,新大陆的金银,尤其是美洲白银为欧洲介入亚洲贸易体系提供了渠道,美洲白银的开采与明朝中国货币白银化几乎是同时的,运输美洲白银的大帆船将欧洲、美洲和亚洲连为一体,“从全球角度来看,马尼拉这座城市的建立意味着人类首次通过不间断的互动把地球大陆连接起来。在英国开启技术革命之后,马尼拉大帆船使美洲大陆加入了大西洋、印度洋和南海的贸易往来,现代世界就此成型。”<sup>①</sup>在全球化的历史叙事中,香料、棉花、蔗糖、奴隶等“商品”都扮演了将世界连为一体的纽带,但是任何一种单一的商品都难以成为全球化叙事的主角。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贸易体系的发展与交通革命是紧密相连的,随着运输能力的提升,可贸易的对象越来越多,一直到当下的超级货轮以及集装箱运输,近乎实现了日常生活的全球化,也就是说人们的吃穿用等日常需求可以通过世界市场来满足。吊诡的是,随着贸易的大发展,贸易在世界市场中的层级在下降,其原因在于金融货币体系的成长,甚至膨胀。

货币金融构成了单一市场体系中的强有力的纽带,如果没有货币金融支撑,人类的交换体系很难近乎无限地延展成为非人格化的跨时空交换体系。货币的本质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网络,其中的内涵是信用,也就是高度精确、可量化的信用体系。“货币和文字都是用符号描述世界的方式,二者均为沟通工具,因而从根本上具有社会性,并且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货币在诸多方面和语言文字一样,与我们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sup>②</sup>货币如同语言一样,扩大了亲密关系和信任半径,以货币为纽带的交换关系超越了以礼物为纽带的交换关系,这是人类合作秩序的一次重大的突破。“货币的使用顺应了数字计算成为人们生活主导的大势。货币交易与互赠礼物等其他社会交易的最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有一个精确的量,你可以给它指定一个精确的数字。货币交易因而突出逻辑和量化等左脑主导的功能。我们将会看到,货币有一种想要控制所有跟它接触过的事物的殖民倾向,因为和数学一样,货币的理念需要将整个世界简化为一种共同、独立的思想体系。”<sup>③</sup>

货币作为交换关系以及信用的符号具有两重属性:一是实物属性,或者说是物理属性,无论贝壳、金银还是其他物品都可以充当货币的符号,基本的特质是稳定、可分割、易储存、流动性好。在历史上,货币是建立大帝国的基础,尤其是贵金属铸币支撑了大帝国内财富的流通,元朝的通货膨胀以及明朝的通货紧缩是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二是货币的虚拟属性,也就是一种信任关系,是人类合作网络的一种属性,与互惠、承诺、兑现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其实是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合作和共识,所以货币转向符号化、虚拟化,比如记账符号;货币越来越体现为数字,比如债券、汇票等。当然,货币的虚拟属性需要制度性的安排,否则就会陷入混乱。货币的两种属性如同中国哲学中的阴阳两极一样,处于不断变化和转换之中,只有保持平衡才能维持货币体系的稳定。

货币量化和简化交易过程,因此,货币会朝着统一的方向演化,形成一个货币体系,比如金银铸币在相当长时间内扮演了交易纽带,信用度高的铸币越过政治、军事边界而成为区域性货币。单一货币体系是货币体系演进的趋势,但并不意味着货币只有一种形式,而是说,货币会分层,形成货币的金字塔,也就是说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基础货币只有一种。“现代复本位制理论几乎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是在实践成功的基础上总结的理论,它是在实践失败的基础上发展出的理论。”<sup>④</sup>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等欧洲国家转向了金本位制,金本位制成为全球性货币体系,英镑高居世界货币体系金字塔的塔尖,这一货币体系也成为英国霸权的重要支撑。稳定的货币体系支撑了全球经济体系,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金本位制及英国主导的全球化。二战尚未结束,重建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

①[美]阿图罗·吉拉尔德斯:《贸易:马尼拉大帆船与全球化经济的黎明》,李文远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第3页。

②[加]戴维·欧瑞尔、[捷]罗曼·克鲁帕提:《人类货币史》,朱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③[加]戴维·欧瑞尔、[捷]罗曼·克鲁帕提:《人类货币史》,第5页。

④[英]威廉·阿瑟·肖:《货币大历史:金融霸权与大国兴衰六百年》,张杰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20年,序言第iii页。

货币体系的计划就被提出来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核心就是重建世界货币体系,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意识到,如果没有大国之间的合作,国际货币体系就难以建立起来。<sup>①</sup>“在1944—1946年间,一种国际主义精神与自由放任原则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而这在过去被认为是种理想主义,是不现实的。战争胜利者放弃了民族国家体系及现代工业时代初期就已开始的对殖民地的争夺,同意建立一个联盟,并自动地解散帝国,为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sup>②</sup>从布雷顿森林会议到马歇尔计划,战后的乐观主义逐渐被冷战的现实取代,马歇尔计划拯救了西欧经济,同时也帮助美元实现了国际化,构建了美国主导的美元体系。美国借助本身的生产能力、金融资源以及战争能力,在二战期间构建了权力的金字塔。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等传统强国不得不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一方面不得不解散自己的殖民帝国,不能再重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镑区、法郎区的戏码;另一方面,西欧失去了与美国进行经济竞争的能力,接受美国的规则,尤其是马歇尔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关贸总协定相互联系,融合成为战后主导贸易、援助和投资的单一体系。退出其中任何一个机构事实上也退出了另外两个机构。不能参加的国家就不能进入西方市场,也不能获得外援和投资了。”<sup>③</sup>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事实上构成了美元—黄金本位,美元登上了货币金字塔的顶端,代表了美国超强的国家信用。<sup>④</sup>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复兴,美元—黄金体系面临着著名的“特里芬难题”。美国不断向世界输出美元,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逆差,尤其是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的大量支出,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不能覆盖在美国之外的美元,这意味着美元和黄金之间的固定比率兑换的承诺难以持续。美元是美国的,但是美元的流通和使用则是世界性的,比如在欧洲美元市场,伦敦成为欧洲美元市场的中心,从事欧洲美元市场交易的金融机构并不受美国管辖。“这些国际银行(离岸银行)不在美国管辖范围内,因此不必遵守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制订的任何黄金覆盖率和存款准备金比率的规定。”<sup>⑤</sup>由此,同样的美元在不同的市场出现了分层,1971年尼克松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终结了美元—黄金体系,而进入了一个美元体系阶段。“在没有黄金的情况下,美国国债就成为唯一的第一层货币,独自站在美元金字塔的顶端。国债本身就是一种信用的形式,其信用来自美国政府的资产和向公民收税的权力。”<sup>⑥</sup>尼克松的做法未必是深谋远虑的经济战略,但为了应对美国经济窘境而出台的政策却历史性地扭转了货币的“阴阳”转换。“尼克松冲击有效地将美元和所有跟美元有联系的货币变成了名义货币。在1000年才发生一两次的磁场倒转中,货币完成了从基于稀缺金属供给到基于国家承诺的转变。”<sup>⑦</sup>在当下的美元体系中,美国国债成为货币基础,而接下来是美元贷款,一国主权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货币转向了它的虚拟一面,而淡去了物理属性。

尼克松冲击之后,美元体系没有崩溃,也没有被取代,除了缺少替代性选择之外,还有赖于美国对其盟国的控制。与货币分层相对应的是军事政治的分层,欧洲国家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发展,但是依然处于美国构建和控制的货币与安全体系之中。随着冷战的终结,两个平行市场被连接

---

<sup>①</sup>T. Gutner, “Collaboration, cooperation, coord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Bretton Woods twins’ efforts to work togeth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30, No. 3, 2023, pp. 965 – 990.

<sup>②</sup>[美]迈克尔·赫德森:《全球分裂: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杨成果、林小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6页。

<sup>③</sup>[美]迈克尔·赫德森:《全球分裂: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第7页。

<sup>④</sup>P. Subacchi & D. Vines, “Fifty years on: What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can teach us about global macroeconomic policy-making”,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39, No. 2, 2023, pp. 164 – 182.

<sup>⑤</sup>[美]尼克·巴蒂亚:《货币金字塔》,孟庆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82页。

<sup>⑥</sup>[美]尼克·巴蒂亚:《货币金字塔》,第90页。

<sup>⑦</sup>[加]戴维·欧瑞尔、[捷]罗曼·克鲁帕提:《人类货币史》,第130页。

起来,美元体系也随之全球化了,美国主导的单一但分层的货币金融体系扩大和膨胀为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美元体系的权力运转的本质和过程是这样的:“该体系在为其成员提供诸如美元流动性、交易和结算便利等‘公共产品’的同时,也使得全球经济对其产生严重的不对称依赖,迫使系统内成员不得不被动地支撑或维系这一体系,而且由于摆脱了黄金约束,它可以‘合法地’放弃其应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相关政策与行为更加具有自利性。”<sup>①</sup>

单一但分层的特征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很少或者没有美元的挑战者与替代者,美元体系既是现实存在的货币体系,也是美国控制世界的工具。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单一性意味着,进入世界市场就是进入美元体系,由此赋予了美元体系以强制性权力。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的金融制裁不断升级,以美元体系的“系统”权力对国家或者个人进行制裁。又因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分层特征,美国高居货币金字塔的顶端,获得了结构性优势,同时,美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外交与协调,进一步强化了货币金字塔的顶部的货币合作,形成了“集体霸权”,<sup>②</sup>比如说美联储与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央行、瑞士银行等多个发达经济体央行之间的协调,强化了货币互换合作,进而夯实了美元体系的政治基础。

### (三) 知识、观念构成的软权力体系

随着教育、媒体、通讯的发展,世界越来越形成一个“全球共同体”<sup>③</sup>,尤其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几乎实现了信息的零成本传播,几十亿人可以共处于一个虚拟空间之中。单一的虚拟空间是否能够带来共同的观念呢?事实表明,并非如此。面对信息的泛滥,注意力稀缺,信息过量,但是真相隐没,“人们可以调整各自的人际联系,组成一个更为紧密的回声仓,与观念接近的人相互交流,让他们的视角变得更加狭隘。”<sup>④</sup>知识、观念和信息交流互动的体系之下是依然分层的等级性结构。相比于货币金融的分层结构来说,观念的分层结构更加复杂,不是严整的金字塔结构,而是混沌状态。

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将“知识”作为一种结构性权力,国际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知识结构来塑造的。最受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自工业革命以来,发明与创新就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引领技术革命的国家和企业获得创新红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新技术革命更是开辟了“新边疆”。与新技术相联系的就是产业,产业不仅仅代表了竞争力、利润,还代表着优质的就业岗位,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创新与产业的竞争。美国拜登政府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就是例证。可以说,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领域已经形成了等级分明的分层结构,而知识产权、专利法等法律规定和维系了这一分层结构;诺贝尔奖则提供了一个世界各国科学知识生产等级的指标。

从观念角度来说,轴心时代产生的文明叙事经历了现代观念,尤其是世俗意识形态、消费主义、工业主义的冲刷之后,迎来了转化与再造。需要承认的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强势的思潮已经流布于世界,20 世纪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世纪,虽然其核心观念有别,但是共同构成了一个现代主义的世界,或者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经历了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之后,被遮蔽或者压制的观念再次复苏,并且成为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多元文明在回归。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提出了“全球政治觉醒”的概念,随着众多非西方国家民众的政治觉醒,西方主导的观念体系面临着重大变局。“当世界权力等级体系缺少连贯性和对未来的共同远景时,地缘政治上的西方国家中,有半数不再积

<sup>①</sup>李锐:《双重冲击:大国博弈的未来与未来的世界经济》,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 年,第 56 页。

<sup>②</sup>Z. Paikin, “Great power rivalry and the weakening of collective hegemony: Revis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4, No. 1, 2021, pp. 22 – 45.

<sup>③</sup>[美]入江昭:《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刘青、颜子龙、李静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

<sup>④</sup>[美]马修·杰克逊:《人类网络》,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第 238 页。

极确保全球地缘政治稳定,全球动荡和政治极端主义的抬头可能成为西方意料之外的遗产。”<sup>①</sup>轴心时代形成的宏大观念体系为普世帝国秩序提供了思想观念基础,在当下国际秩序中,这些文明所内含的思想和观念构成了国家以及区域认同的基础。

互联网塑造了高度互联互通的交流网络,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已经呈现“核聚变”的态势,在这个信息的虚拟空间中,人们被挤压在同一空间之中。当然,在无线电信号发明之后,信息传递速度之快近乎消灭了距离,但是直到自媒体产生之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革命是否改变了知识生产的金字塔结构呢?

首先,信息革命强化了信息传播体系的单一性,进入互联网体系才能获得有效信息和传播信息,也就是信息传播载体的单一性,传统的信息沟通方式依然存在,但是处于逐渐被遮蔽的状态。其次,人人都可以生产和传播信息,但是在高密度的互联互通网络中,处于网络连接中心的机构或者个体处于信息传播体系的顶端,传播网络本身也是等级性的。最后,单一的信息传播空间中,信息过量对个体心理空间产生了极大冲击,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线日渐模糊,自我认同的基础也受到侵蚀,“他者的时代已然逝去。那神秘的、诱惑的、爱欲的、渴望的、地狱般的、痛苦的他者就此消失。如今,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同质化的扩散形成病理变化,对社会体造成侵害。使其害病的不是退隐和禁令,而是过度交际与过度消费,不是压迫和否定,而是迁就与赞同。”<sup>②</sup>比如说自媒体为每个人的自我呈现提供了可能,问题在于自媒体提供了自我表现或者表演的机会,但是并没有增加观众与他者,他人的注意力和时间是稀缺的,要维系亲密关系或者信任关系需要时间的付出。罗宾·邓巴提出的“邓巴数”依然有效,每个人有效的社交网络规模大约在150人,其中核心的朋友只有5人,以3倍递增,15、50、150,最核心的朋友的互动频率大约一周一次,次一级朋友圈是一个月一次,一年一次……“邓巴数”的假说在很多场合都得到了验证,尤其是社交媒体之下,在众多的社交平台的“朋友”重新进行分组,逐渐会形成互动频繁的朋友圈。这是在单一信息空间之下,人类祖先小共同体的重现,这并不意味着返祖,而是人类社会秩序最坚固的逻辑和内核的重现。

从另一个角度也能看到,人类社会复杂系统是小共同体“叠罗汉”一样建构起来的,即便复杂性消失,小共同体依然会存在。交通和通讯技术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便利,极大地扩展了人类互动网络的广度,也大大增加了互动的密度,但是并没有增强体系的深度,基于亲密关系纽带的小共同体并没有相应扩大,甚至相反,拥挤的“陌生人”的世界中,小共同体的边界被重新找回并且强化。“地球表面上每一个有机体的每一个行为都是由储存于这个不断发展的有机体中的基因信息与它所在的环境特征交互作用的结果。”<sup>③</sup>社交媒体时代,身份政治的崛起意味着在高度互联互通的空间中,人类在漫长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时空观念还没有适应如此“加速”和“拥挤”的现代时空。如哲学家韩炳哲所说的,“生命原本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如今也被简化为一种生命机能、生命效能。相应的负面后果是,功绩社会和积极社会导致了一种过度疲劳和倦怠。”<sup>④</sup>

单一但分层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的特征,军事—政治权力、货币—经济权力和知识—观念权力构成了国际秩序的权力支柱,而国际秩序的规则及其运转过程则是秩序的实现方式。这四种形态的权力与国际关系理论所关注的硬权力、黏权力、软权力以及巧权力相对应,由此构成了国际秩序的锥体。四种权力并不是均一的,而是分层次的,其顶端恰恰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基础,我们可以将其称

①[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于卉芹、何卫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②[德]韩炳哲:《他者的消失》,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页。

③[美]彼得·里克森、罗伯特·博伊德:《基因之外——文化如何改变人类演化》,陈姝、吴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④[德]韩炳哲:《倦怠社会》,王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54页。



为“颠倒”的国际权力结构,比如核武器、国际性货币、主导性观念以及主流国际战略构成了国际秩序锥体的上端,如图 1 的第 I 部分,这一部分的权力所构成的权力结构是高度封闭和排他性的;而四种权力相对低层的权力则构成了国际秩序相对开放包容的底端,如图 1 的第 II 部分。这一国际秩序结构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任何一个权力支柱的破损,尤其是顶端部分的松动和变化都会导致国际秩序结构的裂变与重组;在单一但分层的国际秩序中,不同的国家和群体处于不同的等级秩序中,改变自身地位的过程会面临着巨大的系统性约束,越接近顶端部分,会受到越大的挤压,这种挤压来自上下两方面的竞争压力,事实上,单一但分层的国际秩序内部必然会出现纵向的竞争—合作,这也是西方霸权更迭或者转移理论所描述的主要现象。如果系统出现裂变,竞争—合作就会从纵向转为横向,也就是“无政府状态”理论所关注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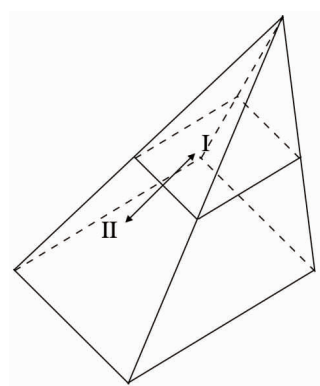


图 1 国际秩序的分层结构

#### 四、结语：国际秩序的演进逻辑

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化浪潮以“大合流”(或者“大趋同”)为特征,一个囊括人员、商品、资本、信息等要素的互联互通网络形成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冷战”后和平条约,就在一夜之间形成了? 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一下子将人们对后冷战秩序的乐观主义情绪中拉回来,在欧洲,进一步说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爆发了一场传统的战争,“大合流”是不是就此逆转了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公开承认,“后冷战已经结束”,从大合流要重新进入“大分流”吗? 本文从长时段的角度对国际秩序的历史结构和演化进程进行了梳理,试图回应当前国际秩序的性质以及未来可能的前景,从人类秩序演进的角度超越“大分流”和“大合流”的争论。

“大分流”理论主要来自以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用来解释中欧之间的不同历史进程,进一步说,中欧之间实力差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彭慕兰认为,欧洲超越中国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中国和欧洲在 19 世纪的“大分流”主要原因是:第一,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煤矿距离大量需求资源的城市更近;第二,欧洲紧邻美洲新大陆,因此幸运地避免了因人口增加而导致的土地匮乏问题。“大分流”的理论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和修正,至少将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大大向后推迟了,但中欧之间在近代“分流”的原因到底如何,依然存在争论。

王国斌和罗森塔尔在《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的研究中认为,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大分流源于这两个地区在政治上的差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并没有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可多得的良机,而是拖慢了经济增长的步伐。18 世纪晚期以前欧洲长期的贫穷,主要是因为每个国家的国土面积都非常有限,因此限制了市场的发展。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出现,其实是欧洲政治乱象



所引发的出人意料的后果,并不是由政府刻意推动和引导的。相反,中国那样一个庞大而稳定的帝国,是其上千年繁荣和强盛的根源。”<sup>①</sup>王国斌和罗森塔尔的观点从更长时段回应了“大分流”的问题,中欧“大分流”的本质是两种不同秩序模式的分殊,进一步说,从罗马帝国在西部崩溃之后,在罗马帝国的故地没有重建起帝国秩序,而是逐渐在演化出了欧洲国家和欧洲国际秩序之后就已经分流了,因此可以说,“罗马之后无罗马”开启了后罗马帝国秩序的大幕。欧洲逐渐形成了横向的竞争—合作逻辑,而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巨型帝国依然是纵向竞争—合作逻辑。如王国斌和罗森塔尔所承认的,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破坏了经济发展,难以像明清时期的中国一样建立起巨型的分工体系,推动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直到18世纪之后,欧洲的横向竞争—合作逻辑催生出了资本密集型经济,资本和技术创新推动欧洲率先进入工业革命时代。欧洲国家之间的横向竞争—合作逻辑造成了两个必然结果:一是整合领土重建帝国非常困难,从而形成了以“均势”为特征的国际秩序,而战争、联盟作为均势体系的工具而合法化;二是贸易和资本形成了跨国界流动,从而形成了与均势秩序相匹配的横向竞争—合作的国际性经济秩序,并且以殖民体系的方式扩展到了全世界。

“大分流”理论是“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事的理论依据,对“大分流”的反思不仅需要如王国斌等人从长时段进行延展,也需要从空间的维度进行分解。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从思想史的角度区分了欧亚关系的四种模式:平行模式(没有共同话语,各自平行发展)、分流模式(富有创造力和活力的欧洲与其他地区分开了,但是亚洲国家有机会弥补他们的“落后”)、抵抗模式(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以世界革命或者民族革命的方式)、替代模式(亚洲要取代欧洲)。<sup>②</sup>分流只是欧亚关系或者说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秩序中的一种,进一步说,它代表了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秩序模式,而难以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历史叙事的模式。在人类历史上相当漫长的时间中,平行模式才是主流,小型共同体是人类秩序的主要组织形态,即便在定居革命和农业革命之后,巨型帝国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也是断续的,从而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了多个帝国和文明中心。分流模式、抵抗模式和替代模式大体可以归入单一但分层国际秩序的行列,可以视为单一体系内的不同类型。对于不同秩序的模式,我们可以大体分为三类:多元平行共存(图2.1)、多元互动共存、单一和谐共存(图2.5)。多元平行共存模式存续的时间最久,各种类型的人类组织在特定的空间中演化,相互之间的互动比较稀少,秩序的演化主要来自各自的演化动力,或者向上朝着复杂系统演化,反之,则是向下回归小共同体模式。全球化的叙事往往过于强调平行的人类组织之间互动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世界各地各自具有空间特征的文明本身印证了多元平行共存模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

随着互动频率和密度的增加,人类组织逐渐形成了稠密的单一网络,根据彼此之间相互嵌套的程度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图2.2模式表示:相互之间在单一但分层的国际秩序结构的底端部分形成了共享的领域,比如说交通运输、贸易以及可共享和传播的专业知识等,彼此之间的合作空间比较大,或者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如果彼此之间的权力比较均衡,那么就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形成良性合作的局面;如果权力处于失衡状态,那就可能形成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性态势,也就是“分流模式”以及“替代模式”。“西方兴起”的故事基本是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不对称竞争,权力与实力的“分流”,最终覆盖和“取代”了非西方地区的传统秩序。图2.3模式所表示的是两种不同力量,其竞争与合作的部分近乎相等,且竞争面已经触及结构性权力部分,由此可能会产生“脱钩”、阵营对垒的态势,美苏冷战基本符合这一模式。图2.4所表示的是合作面大于竞争面,而且在结构性权力上可以共享,冷战后西方国家之间基本处于这种状态。事实上,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核心是英美,这一秩

①[美]王国斌、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周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3页。

②[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全球史讲稿》,陈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63—164页。

序直到 19 世纪末才逐渐形成。“自 19 世纪中叶起,盎格鲁—美利坚以及欧洲式全球秩序上升为主导地位。从那以后,基于此展开的有关实力政治秩序、国际法律建构和全球经济治理的五花八门的观念和现实就层出不穷地被建构了出来。”<sup>①</sup>图 2.5 所表示的是单一体系内多元主体的和谐共存,也代表了和平、合作、互惠的共同体理想。从国联到联合国的建立,代表了构建集体安全、自由贸易国际秩序的努力。如雷蒙·阿隆所说,“1945 年以后,外交领域扩展到地球的极限,外交体系,尽管充满着内部的异质性,现在则倾向于一种法律的同质性,联合国就是这一表现。”<sup>②</sup>这五种类型的秩序的演化和转换,似乎可以构成关于人类秩序变迁故事的主要线索,也为百年变局提供了某种时空框架的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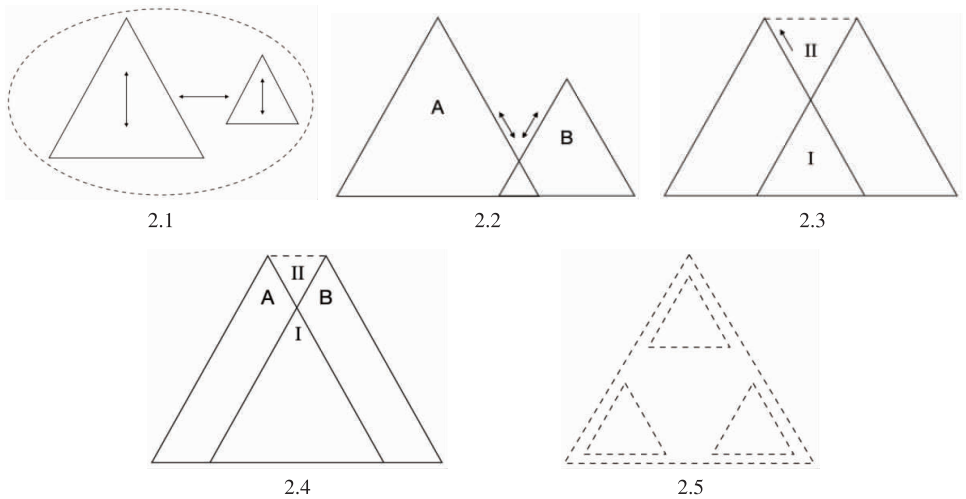


图 2 人类秩序变迁系谱

以人类秩序演化为对象国际关系学研究可以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一定的历史与战略参考,单一但分层的国际秩序是人类社会秩序演化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界定了当下世界的特征。首先,人类社会秩序的重大变迁或者说突变,与气候环境、能源获取等“慢变量”息息相关。农业革命、定居革命以及文明的兴衰起落都与气候变化密不可分,全球暖化给人类提供了更多的物质财富且推动了煌煌帝国的建立,而全球冷化则导致了饥荒和匮乏,但也让人类去反思和适应。时至今日,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需要放在地球史以及文明史的维度去考察,从而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其次,近代以来,国际秩序的变迁动力来自于人的智能的开发,创新、合作、开放等因素助推了西方的崛起,而在单一国际体系之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动力也来自于开放创新的能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主题,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目标,以开放促改革,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顺应并且推动了单一国际体系演化的逻辑,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持久的基础力量。再次,国际体系的单一性意味着世界各国共处在同一个世界,互动能力的提升压缩了时空,尤其是互联网提供的瞬时信息交流使得世界更加“透明”,小共同体的规范和禁忌再次发挥作用,无论国家还是群体都需要关注和在乎“人心”与道义伦理,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包容互鉴。最后,国际体系的分层特性意味着权力结构的变迁是需要时间的。等级性结构或者中心—边缘结构具有自我修复和复制的能力,西方在近代集体崛起并且形成了权力的转移。在分层的国际体系结构之下,非西方国家进入权力金字塔顶端或者权力结构的中心都需要耐

①[英]安德鲁·赫里尔:《全球秩序的坍塌与重建》,林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中文版序第 7 页。  
②[法]雷蒙·阿隆:《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第 101 页。

心,在非西方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需要寻找与传统西方大国和平共处、协同演化、互利共赢之道。单一国际体系并不意味着大国政治只是存量博弈,而是可以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比如人工智能、太空开发、气候变化等等,大国之间的合作可以扩大国际体系的容量,从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也是大国地位和尊严的来源。

2023 年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提出,“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历史自信。”<sup>①</sup>在多元互动共存的单一但分层的国际秩序中,脱钩断链和阵营化并非必然选择,通过相互尊重、合作交流,在增量领域进行合作,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不失为一种务实可能的前景。

(责任编辑:叶 忠)

##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 Single but Stratified International Order

SUN Xingjie

**Abstract:** Such factors as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geopolitical conflict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governance imbalances, and climate change have all contributed to the “mu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stratified”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ts unbalanced development have weakened the momentum of “great convergence”, and a tendency of “divergence” has emerged. Globalization since the 1970s has shaped a “single” global system, yet “single” does not mean “homogeneous”. Difference creates diversity, and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establishes boundaries and shapes identities, constituting the core dynamics and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increasingly gone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state and taken on a greater spatial and temporal meaning. Only by expanding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exploring the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al order can we transcend the Western-centered perspective and state-centrism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analyze the dramatically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by using the diversified human historical experience as a mirror.

**Keywords:** international order; stratified; divergence; human order; long durée

**About the author:** SUN Xingjie, PhD in History,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82).

---

<sup>①</sup>《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2023-12-28,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22977.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22977.htm), 2024-05-26。